

崇厚与晚清外交

汤仁泽

【摘要】崇厚是晚清外交界重要人物之一，先后参与普鲁士、丹麦、荷兰、西班牙、比利时、意大利、奥地利等国约章的签订，担任通商大臣等要职，代表总理衙门，与各国交往，还兼办制造、练兵、海防等事务。他不但是首任三口通商大臣、第一位出使法国大臣，还是首位出使俄国钦差大臣。然而在晚清史籍中，对他却没有提及或很少提及。崇厚其人其事究竟如何？对他该如何评价？从崇厚的任用、失职、处理给我们又有什么启示？本文将就此提出自己的看法。

【关键词】崇厚；满族；通商大臣；外交

【作者介绍】 汤仁泽，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（上海 200235）

崇厚是晚清经办外交的重要人物之一，但是有关中国近代史论著中却没有或很少提到崇厚其人其事。

崇厚因签订《里瓦几亚条约》而遭谴责和唾骂，但他所办外交并非止此一端；他的被斥责查办，又反映了清政府对满族大员的宽容。

本文准备就崇厚的出身以及他的外事活动，探索他在清末外交中的作用，以及清政府对满汉官员的任免态度。

—

崇厚，字地山，号子谦，又号鹤槎，满族人。1826年10月7日生于河南开封道署，是金代皇室完颜氏的后裔，在满洲八旗中属上三旗的镶黄旗。他的八世祖达齐哈，官镶黄旗满洲佐领，管炮营，“从龙入关”，以第五子绥哈阵亡，予世职。七世祖阿什坦，顺治壬辰首科进士，官刑科给事中，“译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、《孝经》著书，诏刊行”，康熙帝称他“此我朝大儒也”^①。六世祖和素，官内阁侍读学士，圣祖御试，清文第一，赐巴克式号，充武英殿繙书房总管、皇子师。所以后人称“金源世系，珂里名门”^②、“三韩贵胄，七叶名卿”^③。

崇厚自述：“高祖刑部侍郎左翼正监督勉斋公；曾祖河南布政使晓岩公；祖山东泰安府知府署理督粮道曙墀公^④；父南河总督见亭公。”^⑤父麟庆（1791—1846年），号见亭，嘉庆十四年（1809年）进士，历任内阁中书、颍州知府、贵州布政使、湖北巡抚、江南河道总督等职，“先生功冠臣僚，位隆帝简，由封疆之敷历，为河海之保障。连汛安澜，频年入奏，中流砥柱，全境胥恬，漕运周通，皆是韦平经略，荣光焕发。并为燕许文章，九能而为大夫；勋名世仰，一德以孚圣主”^⑥。由于政绩突出，曾“奉硃批，有一代名臣之奖”^⑦。崇厚兄崇实（1820—1876年），道光三十年（1850年）进士，历任内阁学士、户、工部侍郎、太傅寺少卿、驻藏大臣、四川总督、成都将军、刑部尚书、盛京将军等职，卒后追赠太子少保衔，照尚书例赐恤，予谥文勤。

^① 《清史稿》卷484，列传271，中华书局1977年8月版，第13336页。

^② 麟庆著文、汪春泉等绘图：《鸿雪因缘图记·钟世耀序》第一集，北京古籍出版社，1984年10月版，第1页。

^③ 麟庆著文、汪春泉等绘图：《鸿雪因缘图记·祁寓藻序》，第1页。

^④ 崇实撰：《惕庵年谱》：“祖山东泰安府知府署理山东督粮道曙墀公”。见沈云龙主编：《近代中国史料丛刊》第五十二辑，台湾文海出版社1966年版，第1页。

^⑤ 崇厚述、衡永编：《鹤槎年谱》，民国十九年刊本，第1叶。

^⑥ 麟庆著文、汪春泉等绘图：《鸿雪因缘图记·钟世耀序》，第1~4页。

^⑦ 崇实撰：《惕庵年谱》，第16页。

崇厚原名宗保，是祖母给他起的。父麟庆的元配夫人瓜尔佳生一兄，名凤威；二叔生一堂兄，名凤仪，皆不育，祖父母以‘凤’字不利。祖父廷璐“因官泰安，近岱宗，即取山宗之意，定以‘崇’字排诸孙。下一字则取各吉祥字，共拟十数，惟‘实、厚’二字乃太夫人所拟”^①。为崇厚取名的太夫人（祖母）恽珠（1771—1833年），自称毗陵女史，武进（今江苏常州）人，恽寿平族孙女，“亦能画，善为诗”，辑《闺秀正始集》、《兰闺实录》，著《红香馆诗草》。“珠抚诸子麟庆、麟昌、麟书，教之严，持家政，肃而恕”^②，恽珠以子麟庆贵，封一品夫人。

崇厚六岁“始入塾识字，授读者赵綱人夫子”。八岁时，“由京邀请潘滋泉夫子，设帐清晏园中”，与兄崇实“皆受业焉”。“从潘夫子读书，朝夕训诲，厚之能读书成立，受益于夫子者最多”^③。崇厚十六岁时，父亲“为三兄报捐同知，为厚报捐直牧”，未果。十九岁时，崇厚应秋试，“获中第三十四名副榜”。直至道光二十九年（1849年）二十四岁时，“厚应顺天乡试，榜发，获中二百七名举人，复试二等”^④。次年，兄崇实中进士，然而崇厚最终没能成为进士。

考取举人，只是取得了入仕资格，要想青云直上绝非易事，或者凭自己的能力努力拼搏，赢得赏识，委以重任；或者依靠皇室的荫庇和宠信，崇厚乃属后者。

道光三十年（1850年）崇厚二十五岁，任甘肃阶州直隶州知州。阶州“地处万山中”，崇厚携带眷属赴任，多不习水土。此时“因内外官员皆须助饷”，其兄崇实“即为之报效万金”^⑤，为崇厚捐升知府，指省河南。

这年三月，兄崇实参加会试，“四月，榜发，获中五十三名贡士。殿试二甲，朝考二等。引见，钦点庶吉士”^⑥。崇实中进士、入翰林，为迅速改变兄弟两人的命运起到关键作用。

咸丰三年（1853年）二月，崇实蒙召对，“即蒙详询家世，并问及与内庭主位有无亲戚。实愕然，不解上意，乃回奏曰：锡祉是奴才长亲，缘内庭婉嫔，乃锡子绶胞妹，实不敢明言有亲也。上笑，谕曰：汝父所刻之书，昨在宫内已看见矣。实方恍然，当即磕头奏曰：此奴才阿玛生平感激君恩祖德，每于所难忘情处，手自为记，即画一图。……上即问汝弟现服何官，一一奏对，天颜颇喜。从此上结主知。不数日，御门即擢升侍讲学士，而于得讲官”^⑦。

“汝父所刻之书”，指麟庆著文、汪春泉等绘图的《鸿雪因缘图记》一书，是自述一生游历之作，潘世恩作序称：“能以宦游辙迹所至，见之著录，垂示方来。”^⑧

此次召对后，兄弟皆受益。“四月，厚在甘肃交代清楚，由兰州经陕西回京。中秋后在吏部报到。九月，由吏部带领引见。奉旨：指分河南候补知府，崇厚照例发往。钦此。”接旨的第二天，崇厚赴宫廷谢恩，即蒙召对于玉兰堂。上问：“现任侍讲学士崇实是汝胞兄否？”对曰“是”。垂询现在陕甘情形后，即命退出。旋降硃笔手谕：崇厚著发往直隶，以知府用。崇厚蒙召对，“指分河南候补知府”即刻变为“发往直隶，以知府用”，从西北陕甘调入直隶，出崇厚意料之外，感慨道：“厚经此硃谕，竟成特旨。天恩高厚，下臣何幸如之。”^⑨其兄也惊叹：“按加捐知府，仍归试用，硃笔一改，即成特班。天恩高厚，一至于此。”^⑩加捐知府未经试用直接任用，而且是在直隶，拔擢实在突然。

不数日，崇实以翰林院值日蒙召对，“垂询外间情形，时胜保以兵部少司马新授钦差大

^① 崇厚述、衡永编：《鹤槎年谱》，第1叶。

^② 《清史稿》卷580，列传295，第14026页。

^③ 崇厚述、衡永编：《鹤槎年谱》第3~4叶。

^④ 崇厚述、衡永编：《鹤槎年谱》第12叶。

^⑤ 崇实撰：《惕庵年谱》，第56~57页。

^⑥ 崇厚述、衡永编：《鹤槎年谱》，第13叶。

^⑦ 崇实撰：《惕庵年谱》，第58~60页。

^⑧ 麟庆著文、汪春泉等绘图：《鸿雪因缘图记·潘世恩序》，第1页。

^⑨ 崇厚述、衡永编：《鹤槎年谱》，第15~16叶。

^⑩ 崇实撰：《惕庵年谱》，第65~66页。

臣，追贼山西，声威甚著”，问崇实与胜保认识否？对曰：“胜保之父于臣父乡试同榜，以年谊，臣等自幼与胜保相熟。其人血性胆略皆能过人，所虑者骄矜耳”。退出后，即奉旨：“崇厚著发往胜保军营，充当翼长。”崇厚再次感叹道：“擢用之殷，真非梦想所敢期也”。^①

崇厚是金代皇室完颜氏的后裔，“麟庆为世宗旁支二十四代孙”^②，祖上对建立清朝作出贡献，后人倍受朝廷的恩宠眷顾。道光十七年（1837年），崇厚的姐姐妙莲保“循例赴选”，“上谓孝全皇太后曰：此女有福泽，貌似其父。命赐红稠一卷，后命加赐翠花两对，摺牌而退。实为非常恩典。”麟庆上奏陈谢：“有既叨赐绮之荣，复拜簪花之赏，不特全家戴德，直教合族增光”。又说“凡兹家庆之缘，实皆君恩所赐也。”^③道光十九年（1839年），麟庆年五十岁，皇帝颁赏福字、鹿肉外，蒙恩加赏寿字一方。当时满族大臣，官至一品，年逾六旬者，始邀寿字之赏。而麟庆官二品，年仅四十有九，实为异数。光绪二年（1876年），崇实病逝，崇厚“奉旨署理盛京将军。兄弟继，诚异数也”^④。

崇厚因煊赫的家世而倍受荫庇，接二连三地被拔擢和重用，连他自己都感叹“天恩高厚，下臣何幸如之”，“非梦想所敢期也”。

二

崇厚所处的时代，正值中国社会发生重大变革的时代，沿袭二千余年的封建社会已经走到穷途末路。1840年，英国发动了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，“天朝上国”战败，于1842年8月订立《南京条约》，自此，中国禁闭的大门被迫打开，法、美、俄等资本主义列强接踵而至。十多年后，英、法在俄、美的支持下联合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，天津海口军情危急，崇厚奉命奔赴天津，襄理僧格林沁在大沽海口办理海防事务。

咸丰八年（1858年）崇厚三十三岁。三月，崇厚奉檄调赴天津，襄理僧格林沁在海口办理防务。三月二十六日崇厚给沅卿的信中说：“弟于十一日早奉札调赴津门，星夜驰抵丁沽，当即随大府到大沽海口，蒙委经理营务兼司分局，才轻任重，陨越时虞，惟望教言时锡，以匡不逮为幸。”^⑤崇厚于三月十一日早奉札调赴津门，星夜便驰抵丁沽，当即随僧格林沁到大沽海口，蒙委经理营务兼司分局。信中还言皇上之意“重在怀柔”，而“夷情更形桀骜，出言狂悖，深堪发指”。

在给沅卿的另一封信中，崇厚这样写道：“僧邸现住海口，添筑炮台，安设木筏，颇为周备。惟新募水师兵丁均因饷少，旋募旋散，未能足额，然较之去年已大有起色矣。厘捐目下寥寥，需俟沙船来，方能畅旺也。弟现在专司文案，同事鲍小山同年均为投契，仁齐兄昨日来津，大约三四日内尚需赴山海关一行也。”^⑥此时，僧格林沁已在海口添筑炮台，安设木筏。崇厚襄理僧格林沁，在大沽海口办理防务，专司文案。

1858年初，英法联军为更大规模的进犯做好了准备。5月20日（四月初八日），英法专使要求进入白河，前往天津，限直隶总督谭廷襄在两小时内交出大沽炮台，由英法联军“驻守”。两小时后，英法联军闯入大沽口，攻占大沽炮台。

6月26日（五月十六日），清钦差大臣桂良、花沙纳与英国全权代表额尔金在天津签订《中英天津条约》。共五十六款，另附《专条》。6月27日（五月十七日），清钦差大臣桂良、花沙纳与法国全权代表葛罗在天津签订《中法天津条约》。共四十二款，另附《和约章程补

^① 崇厚述、衡永编：《鹤榭年谱》，第16叶。

^② 麟庆著文、汪春泉等绘图：《鸿雪因缘图记》第三集《房山拜陵》。（按：该书正文未标页码。下同。）

^③ 麟庆著文、汪春泉等绘图：《鸿雪因缘图记》第二集《赏春开宴》。

^④ 崇厚述、衡永编：《鹤榭年谱》，第29叶。

^⑤ 《崇厚给沅卿信》，中国史学会主编：《第二次鸦片战争》资料丛刊，第一册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，第636～637页。

^⑥ 《崇厚给沅卿信》，《第二次鸦片战争》资料丛刊，第一册，第654页。

遗》六款。

《天津条约》订结后，英、法撤离大沽。咸丰帝命僧格林沁修筑大沽炮台营垒，派礼部尚书瑞麟往天津查看海防，直隶总督谭廷襄被革职查办，调盛京将军庆祺为直隶总督，会同办理防务。1859年3月，庆祺亡故，恒福继为直隶总督，亦驻天津，会办海口防御工事。

1859年“九月，厚升授长芦盐运使”，但有顾虑，“因家中先有资本，交张氏营运盐务，呈请回避，与山东盐运使陈弼夫互调”，僧格林沁为他上奏调解，“崇厚协办海防，正资得力”消除其顾虑，后奉旨：“毋庸回避。”^①崇厚仍留在天津海口，继续协助僧格林沁。

这年5月，美国新任驻华公使华若翰“被指示前往北京向皇帝递交一封总统的亲笔信函，以完成批准条约的相互交换”，于5月28日，搭乘蒸汽快速舰“包哈丹”号抵达上海，英国公使普鲁斯、法国公使布尔布隆也分别于6月6日、7日到达上海，各自携带本国政府批准的《天津条约》前来换约。三国公使不愿在上海换约，声言非进京换约不可。桂良为此上奏，咸丰帝允准来京，但不准在京久驻。

崇厚自称：“美国使臣来京换约，厚奉命伴送，在京小作勾留。”^②美使华若翰于7月20日（六月二十一日）自北塘前往北京，由崇厚伴随照料。《皇家亚细亚学会会刊》记述了此事：“16日（直隶）总督发来一封文书，声称他曾奉到‘皇帝的谕旨，允许美国使节于7月19日后随意选择任何日期前往京城，在那儿等待钦差大臣到达，和他们进行条约的互换’。他通知华若翰先生说，他曾指派盐运使衔清河道满族人崇厚，副将衔候补参将张秉铎作为陪伴他的护送人。同他们一道的还有一个姓李的候补道以及其他比较低级的官吏，总共大约二十个七品以上的官员。”^③陪伴美使华若翰的二十多位护送人员中，崇厚的品级最高。自此，崇厚步入“外交”之道。

1860年8月23日（七月七日），英法联军攻陷天津。次日，咸丰帝命大学士桂良、驰赴天津，会同直隶总督恒福与英法谈判，两人均授为钦差大臣，又以武备院卿恒祺为帮办大臣，与英、法公使议和。8月31日（七月十五日），桂良抵达天津，即与恒福照会英、法二使，定日会议。英国使臣额尔金等声称：“现在并未罢兵，前已将所办各事，节经照会，俟一概允准照复前来，再行晤面。此时无可商办，毋庸相见”，桂良等无从措手。两天后，晤英参赞巴夏礼、威妥玛，巴夏礼威胁道：“（咸丰）八年和约，及本年二月间照会，与在津要求各款，必得一概允准，不容稍事商量，如有一款不准，即带兵北上。”^④

清政府急于办理“抚局”，委派钦差大臣办理与英、法等国侵略者的议和事宜，崇厚协助钦差大臣，直接参与“抚局”。

9月5日（七月二十日），钦差大臣大学士桂良、直隶总督恒福、武备院卿恒祺上奏折：“为接到英、佛两国罢兵照会，（硃批：包藏祸心，焉得谓之罢兵。）并议减赔偿现银，及巴酋（夏礼）即欲先期进京，恭折奏闻，仰乞圣鉴事。……至进京换约之期，本拟将各款议定后，再令入都。今该酋来称：额酋（尔金）定于二十一日与奴才等晤面，二十二日，即须将现定各款，彼此当面盖印画押后，即先令巴夏礼随带数十人进都，观看沿途及京中房屋住址。奴才等令其从缓再去，乃急不可待，并称：此处少延一日，即可省一日兵费，以便早日换约等语。窃思夷情反复，彼既志在换约，不若迎机而导，俾得迅速定议，免致再生枝节。奴才桂良与奴才恒福因尚有与额酋等商办将来驻京及通商一切章程，奴才恒福并因地方紧要，未敢抽身。现拟派令长芦运使崇厚随同奴才恒祺，伴送巴酋先行进都，照料沿途及到京一切事宜。”^⑤

^① 崇厚述、衡永编：《鹤楼年谱》第18叶。

^② 崇厚述、衡永编：《鹤楼年谱》第18叶。

^③ 《皇家亚细亚学会会刊》，中国史学会主编：《第二次鸦片战争》资料丛刊，第六册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，第227页。

^④ 萧一山：《清代通史》卷下，台湾商务印书馆1962年9月版，第499页。

^⑤ 《桂良、恒福、恒祺奏接到英法照会并议减赔款及派人进京折》，《筹办夷务始末》（咸丰朝）卷五十九，

大学士桂良、直隶总督恒福奏请委派长芦运使崇厚随同武备院卿恒祺，伴送巴夏礼先行进都，照料沿途及到京一切事宜。

桂良、恒福、恒祺等办理“夷务”，并未挽回局面。9月9日（七月二十四日），咸丰帝以“办理夷务，未能妥协”为由，撤去桂良、恒福的钦差大臣职，撤去恒祺的帮办大臣职，另派怡亲王载垣、军机大臣兵部尚书穆荫为钦差大臣，“由通（州）赴津，筹办抚局”^①。咸丰帝想通过载垣、穆荫与英法谈判，劝说英、法军队退回天津。时隔十多日，9月21日（八月初七日）咸丰帝又怪罪“载垣、穆荫办理和局不善”，两人均被“撤去钦差大臣”，改授恭亲王奕訢“为钦差便宜行事全权大臣，督办和局”^②。这样，督办和局、夷务的大权，终于落入恭亲王奕訢手中。

就在恭亲王奕訢受权的当天，英法联军进攻距北京城只有八里的入京要道八里桥，驻守在八里桥的僧格林沁、胜保和瑞麟的部队，迎头痛击侵略军。“八里桥之役，中国军队以少有之勇敢迎头痛击联军。他们的军队是由两万五千名鞑靼骑兵和为数众多的民团所组成的，然而还打不过一小群欧洲人，这的确是事实。法国和英国的炮兵压倒了他们的箭、矛、迟钝的刀和很不象样的炮”^③。尽管“中国军队以少有之勇敢迎头痛击联军”，但是僧格林沁的马队抵挡不住敌军枪炮的攻击，胜保、瑞麟的部队和临时组成的民团不敌训练有素的“欧洲人”。

僧格林沁和崇厚知晓“天津为京师门户，通州为近畿唇齿，万一稍有疏失，全局震动，所关匪细”^④，并精心修筑了海防工事，但不堪洋炮洋枪的一击，彻底瓦解了。八里桥失陷的第二天，咸丰帝自圆明园启銮，率领御前大臣、军机大臣及后妃等，匆忙逃奔热河。其弟恭亲王奕訢，受命留守北京，办理“抚局”，并一再举荐崇厚加入。

1860年10月22日（九月初九日），恭亲王奕訢再次保举崇厚等人办事勤能，堪以差委：“臣等办理抚局，并调兵筹饷，事务纷繁，差委需员。适有二品顶戴长芦盐运使崇厚、盐运使衔天津道孙治、盐运使衔通永道德椿奉差前来，察看该司等办事勤能，堪以差委。”咸丰帝阅后硃批：“知道了。”^⑤

奕訢等惟恐恒祺一人遇事无从商酌，易受“该夷挟制”，11月8日（九月二十六日）再次上奏：“臣等再四筹商，非有熟悉夷情之大员前往术驭，不足以弥后患”，举荐崇厚才识练达，办事精细，且曾经办过夷务，熟谙一切。拟令其帮同恒祺办理抚局，实于诸事有裨，设将来该夷小有不协，即可随时酌办，倘或事关紧要，亦可从长商量，不至令该夷率行来京，再肆狂悖。“所有臣等拟令恒祺等在津办理之处，可否仰恳皇上天恩，明降谕旨？命武备院卿恒祺，办理海口通商事宜，并长芦运司崇厚帮同办理。拟明岁该夷驻京时，再于该二员中酌调一人来京，以便羁縻。如蒙俞允，臣等即当责成恒祺等，随时妥为酌办，无负委任。”^⑥

同日，奕訢再次举荐：“二品顶戴、长芦运司崇厚，臣桂良在津时，因知该员熟谙夷务，飭令与该夷商办一切，乃夷酋以该司管理盐务，未便与闻其事，总须钦派京员，方能与之商议。此次随臣等暗中设法，颇资得力，臣等现因需人之际，拟当量为变通。可否仰乞天恩，将二品顶戴长芦盐运司崇厚开缺，以三四品京堂后补，俾夷人知该员既奉简命，自可信服，并与恒祺体制相当，诸事不致掣肘。……臣等未敢擅便，是否有当，理合附片请旨。伏乞圣

第6册，第2213~2215页。

^① 《廷寄》，《筹办夷务始末》（咸丰朝）卷六十，中华书局排印本，1979年版，第6册，第2262页。

^② 《上谕》，《筹办夷务始末》（咸丰朝）卷六十二，第7册，第2335页。

^③ 吉拉尔：《法兰西和中国》，中国史学会主编：《第二次鸦片战争》资料丛刊，第六册，第293页。

^④ 《宽惠、崇厚奏大沽情形危迫请救瑞麟移营天津折》，《筹办夷务始末》（咸丰朝）卷五十六，第6册，第2112~2114页。

^⑤ 《奕訢等又奏办理需员察看崇厚等堪以差委片》，《筹办夷务始末》（咸丰朝）卷六十六，第7册，第2473页。

^⑥ 《奕訢、桂良、文祥奏拟令恒祺、崇厚办理海口通商事宜折》，《筹办夷务始末》（咸丰朝）卷六十八，第7册，第2555页。

鉴训示。”^①

咸丰帝允准，“长芦盐运使崇厚，著开缺以三四品京堂后补”，又谕：“恒祺、崇厚，著办理海口通商事宜”，“武备院卿恒祺，著办理海口通商事宜；候补三四品京堂崇厚，著帮同办理”^②。咸丰帝又令恒祺、崇厚等在津抚驭夷人，可作为奕訢随员，“所有通商琐屑事务，由恒祺等办理；遇有要事，仍应禀明恭亲王等酌办，应具奏者，由恭亲王等具奏，恒祺等不得具折”^③。

崇厚办理“抚局”，辛苦劳累，奕訢于1860年12月24日（十一月十三日）为崇厚等人请功：“因后补京堂崇厚熟悉夷情，札飭随同恒祺等前赴夷营，面与该酋商定条约。……所有内务府大臣衔武备院卿恒祺、前任仓场侍郎崇纶、二品顶戴候补三四品京堂崇厚，应如何给予奖励之处，出自圣裁。”^④崇厚“熟悉夷情”，随同恒祺等前赴夷营，面与夷酋商定条约，“于夷情猖獗之时，屡次出入夷营，备历危险，得以次第换约。”为了据实陈明他们的“劳绩”，请求咸丰帝给予奖励。同日，颁谕旨：“恭亲王奕訢等奏：请将办理换约事宜出力大员，量与奖励等语。内务府大臣衔武备院卿恒祺，著加恩赏给头品顶戴。前任仓场侍郎崇纶，著加恩开复侍郎，仍交部议叙。候补三四品京堂崇厚，著加恩赏给侍郎衔。”^⑤这样，崇厚一跃成为侍郎，品秩为从二品。

崇厚最初是襄助僧格林沁，在大沽海口办理防务、专司文案的，接着伴送美国使臣到京城换约，最后直接参与“抚局”。面对突如其来的“夷务”，一切都是未知数，当时找不到精通“夷务”的合适人才。崇厚是在危难之际被选中，尽管在与“洋人”交涉中没有任何优势，但他尽了力，由候补三四品京堂晋升至侍郎。

三

咸丰十年九月（1860年10月），中英、中法《北京条约》签订，又增开天津为通商口岸，“洋务”事务日益增多，外国人可以自由进出内地经商、传教、游历等。1861年1月11日（咸丰十年十二月初一日^⑥），钦差大臣恭亲王奕訢、大学士桂良、户部左侍郎文祥“悉心参度，统计全局”，奏请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，拟定《章程六条》。第一条“京师请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，以专责成也”，凡涉及外人的事务，都归其管；第二条“南北口岸，请分设大臣，以期易顾也”。考虑到通商之初，只有广州、福州、厦门、宁波、上海五口，设立钦差大臣一员，新定条约后，“北则奉天之牛庄、直隶之天津、山东之登州，南则广东之粤海、潮州、琼州，福建之福州、厦门、台湾、淡水，并长江之镇江、九江、汉口，地方辽阔，南北相去七八千里，仍令其归五口钦差大臣办理，不独呼应不灵，各国亦不愿从。”还考虑到天津的特殊地位：“且天津一口距京甚近，各国在津通商，若无大员驻津商办，尤恐诸多窒碍。拟请于牛庄、天津、登州三口，设立办理通商大臣，驻扎天津，专管三口事务。”^⑦

在上奏《通筹夷务全局折》的同一天，奕訢等又奏《英使来京意在撤兵，并向其微露设

^① 《奕訢等又奏请将崇厚开缺以三四品京堂后补片》，《筹办夷务始末》（咸丰朝）卷六十八，第7册，第2557～2558页。

^② 《上谕》，《筹办夷务始末》（咸丰朝）卷六十八，第7册，第2559页。

^③ 《廷寄》，《筹办夷务始末》（咸丰朝）卷六十八，第7册，第2560页。

^④ 《奕訢、桂良、文祥奏恒祺、崇纶、崇（厚）恩请给奖励折》《筹办夷务始末》（咸丰朝）卷七十，第7册，第2655页。

^⑤ 《上谕》，《筹办夷务始末》（咸丰朝）卷七十，第7册，第2655～2656页。

^⑥ 《筹办夷务始末》为十二月初三日，该日为奏折递达皇帝行在之日，上奏日应为十二月初一日，见《第二次鸦片战争》，第五册，第340页。另该奏折又称《通筹洋务全局酌拟章程六条折》。

^⑦ 《奕訢、桂良、文祥奏统计全局酌拟章程六条呈览请议遵行折一附章程六条》，《筹办夷务始末》（咸丰朝）卷七十一，第8册，第2674～2676页。

立总理衙门事片》，禀报英国公使威妥玛，带二名随从，来京谒见，以查看明年住京房屋为词，实以该国天津之兵需费浩繁，拟悉行裁撤。又疑撤兵之后，中国别有准备，不敢遽撤，来京探询究竟。奕訢“窥知其来京实为撤兵起见”，并“迎机开导，以释其疑，微露有设立总理之外国事务衙门，专办各外国事务。”威妥玛闻知设立总理外国事务衙门一事，“甚为欣悦”，说：“向来广东不办，推之上海，上海不办，不得已而来京。如能设立专办外国事务处地方，则数十年求之不得，天朝既不漠视，外国断不敢另有枝节。”^①

也在这一天，奕訢等又奏《恒祺请留京天津通商大臣请于崇厚崇纶内简放片》：“臣等请设总理公所，并天津通商大臣，原期与上海南北分理其事，而汇总于京师，以收身使臂、臂使指之效。如天津办理得宜，则虽有夷酋驻京，无事可办，久必废然思返，是天津通商大臣最关紧要。臣等前于夷酋带兵回津时，奏请简派驭夷大员前往。奉上谕：恒祺著办理海口通商事宜，崇厚著帮同办理。钦此。”奕訢等请设总理衙门，并设天津通商大臣，为的是与上海南北分理外交事务，而“汇总于京师，以收身使臂、臂使指之效”。如天津办理得宜，“则虽有夷酋驻京，无事可办，久必废然思返”，也没有“夷酋”久留京城的烦恼，所以“天津通商大臣最关紧要”。谁能当选？奕訢等人首推崇厚：“至侍郎衔侯补京堂崇厚，久在天津，于地方情形既能熟悉，而控驭外夷，亦能权智兼济，不至拘执乖方。又仓场侍郎崇纶，随同办理以来，察其用意羁縻之中，刚柔互用，尚知力持大体，不至为该夷狎习。以上二员均能胜任，现当需才孔亟之时，且以后立有章程，事务较简。仰恳皇上天恩，于崇厚、崇纶二员内，简放一员前赴天津，作为办理通商大臣，毋庸再设帮办之处，伏候钦定。至上海夷务关系紧要，如薛焕因军务纷繁，有不能兼顾之处，再行察看情形，另行请旨办理”^②。

举荐崇厚的理由是：“久在天津，于地方情形既能熟悉，而控驭外夷，亦能权智兼济，不至拘执乖方”，并要在崇厚、崇纶二人内选出一人为天津通商大臣。

天津通商大臣即三口通商大臣，统辖“奉天之牛庄、直隶之天津、山东之登州”，入选天津通商大臣并非易事。天津是府治，开为通商口岸，需要一位职位较高的官员管理，而直隶总督驻省城保定，不能兼顾。直隶为畿辅重镇，天津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及在政治、经济、军事上的重要性，清朝官员都非常清楚。《天津条约》签订时，山东道监察御史陈浚奏：“臣窃揣夷人既求入驻京城，必求添设马（码）头，其所求添设之马（码）头，必系天津、镇江等处。何以言之？天津为海河总汇，镇江据江淮要冲，漕盐之所往来，商贾之所辐辏。若该夷得遂其狡计，数年之后，天下之利权归之，中国之民命系之，必至束手受制，无可奈何，其祸患岂徒伤威损重已乎？”^③

如此重要职务的委任，咸丰帝一时难以定夺，硃批：“著军机处暂行存记，俟议定后再降谕旨。”^④又将《通筹夷务全局折》及《章程六条》交惠亲王绵愉等审阅，令“惠亲王、总理行营王大臣、御前大臣、军机大臣妥速议奏”。

参理“夷务”，协办“抚局”，官员需经过推荐、遴选后才能任用。陕西道御史徐启文认为通商各口委任官员，应慎选派廉洁、明干、有为之人，1860年12月24日（十一月十三日）上奏提出：“现在各口通商事宜，已经钦派大员前往办理，惟从来接驭外夷，结之以信，感之以恩，而终不可以示之（以）弱，各省通商处所，在督抚大臣，必能权衡通变”，徐启文以为“即丞倅州县，亦应以操守廉洁明干有为之员遴遣调委，或不至启衅损威”^⑤。咸丰

^① 《奕訢等奏英使来京意在撤兵，并向其微露设立总理衙门事片》，中国史学会主编：《第二次鸦片战争》，第五册，第346页。

^② 《奕訢等又奏恒祺请留京天津通商大臣请于崇厚崇纶内简放片》，《筹办夷务始末》（咸丰朝）卷七十一，第8册，第2681~2682页。

^③ 陈浚奏：《请撤回桂良、花沙纳并敕僧格林沁妥筹战和折》，中国史学会主编：《第二次鸦片战争》资料八刊，第一册，第454页。

^④ 《奕訢等又奏恒祺请留京天津通商大臣请于崇厚崇纶内简放片》，《筹办夷务始末》（咸丰朝）卷七十一，第8册，第2682页。

^⑤ 《徐启文奏通商各口委员应以廉洁明干者调派折》，《筹办夷务始末》（咸丰朝）卷七十，第7册，第2656页。

帝赞同，并在这行文字旁加点硃笔，并谕军机大臣等：“本日据御史徐启文奏称：各省通商处所，宜慎选委员，以免启衅损威等语。奉天牛庄、直隶天津、山东登州等海口通商，事属创始，该将军等于各夷到后，遇有交涉事迹，自必斟酌妥善。惟地方州县及差委各员，倘不洁己奉公，必至为该夷轻视，甚或播弄是非，因而启衅，于抚局大有关系。著玉明、倭仁、景霖、恒福、文煜，于各该州县及办理海口通商各委员，务择操守廉洁明干有为之员酌量调派，责令认真经理。不得令庸劣之员办理夷务，以致启衅损威，是为至要！”^①

谕旨内特别强调奉天牛庄、直隶天津、山东登州三口“事属创始”，“遇有交涉事迹，自必斟酌妥善”，谕令玉明、倭仁、景霖、恒福、文煜等官员，慎选派廉洁、明干、有为人员，委以办理海口通商事宜的重任，以免“启衅损威”。

1861年1月19日（十二月初九日）惠亲王绵愉等奏复：“臣等将所拟章程公同详阅，悉心酌覆（覈），恭亲王奕訢等筹议各条，按切时势，均是实在情形。可否请旨按照原议各条办理之处？伏候圣裁。其未尽事宜，应由恭亲王奕訢等随时详议具奏，请旨遵行。”^②

次日，咸丰帝谕令内阁，奕訢等所奏六条，均照原议办理：“侍郎衔候补京堂崇厚，著作为办理三口通商大臣，驻扎天津，管理牛庄、天津、登州三口通商事务，会同各该将军、督抚、府尹办理。并颁给办理三口通商大臣关防，无庸加钦差字样。其广州、福州、厦门、宁波、上海，及内江三口、潮州、琼州、台湾、淡水各口通商事务，著署理钦差大臣江苏巡抚薛焕办理。新立口岸，除牛庄一口仍归山海关监督经营外，其余登州各口，著各该督抚会同崇厚、薛焕派员管理。”^③

咸丰帝批准京师设立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，派恭亲王奕訢、大学士桂良、户部左侍郎文祥，总理各国通商事务，任命侍郎衔候补京堂崇厚为三口通商大臣，驻扎天津，管理牛庄、天津、登州三口通商事务，会同各该将军、督抚、府尹办理，并颁给办理三口通商大臣关防，既办理三口通商事务，又可调度天津防军，但不加“钦差”字样。任命薛焕为五口通商大臣，“其旧有五口及新增各口通商事宜，仍著薛焕办理”^④。1863年2月13日，薛焕被召入京，由江苏巡抚李鸿章署理五口通商大臣，直至1866年12月7日，五口通商大臣改由两江总督曾国藩兼任。

自南北口岸分设大臣后，分别驻扎上海、天津。《章程六条》第四条称：“嗣后天津通商大臣、上海钦差大臣，以及各省一切奏牍，及钦奉上谕事件，除咨报总理处外，均应敕令随时互相咨会。”“北洋通商大臣”即“三口通商大臣”，又称“天津通商大臣”；“南洋通商大臣”即“五口通商大臣”，又称“上海钦差大臣”。

四

三口通商大臣的主要职能是办理通商和交涉事务，就任之初，崇厚即投入繁忙的外交事务中，随着国内外局势的飞速发展，中外交往日趋频繁，他主管的事务也不断增多。自同治二年（1863年）五月至八年（1869年）六月，崇厚先后参与普鲁士、丹麦、荷兰、西班牙、比利时、意大利、奥地利等国约章的签订。他专任通商大臣要职，代表总理衙门，与各国交往，直至1870年6月28日（五月三十日）因天津教案，“奉旨，三口通商大臣兵部左侍郎崇厚，著充出使大法国钦差大臣”^⑤，派大理寺卿成林（总理衙门大臣）署三口通商大臣为

页。

^① 《廷寄》，《筹办夷务始末》（咸丰朝）卷七十，第7册，第2656～2657页。

^② 《绵愉等奏遵议奕訢奏章程请照原议办理折》，《筹办夷务始末》（咸丰朝）卷七十二，第8册，第2691页。

^③ 《上谕》，《筹办夷务始末》（咸丰朝）卷七十二，第8册，第2691～2692页。

^④ 《廷寄》，《筹办夷务始末》（咸丰朝）卷七十二，第8册，第2693页。

^⑤ 《筹办夷务始末》（同治朝）卷七十二，见沈云龙：近代中国史料丛刊，台湾文海出版社1966年10月版，

止，任职时间近十年之久。除办理通商、外交外，还负责兼办海防、训练“洋枪队”和创办生产军火的天津机器局。1870年后，三口通商大臣职务改由直隶总督兼职。李鸿章在1873年的奏章中，总结近十余年来外交与通商事务时说：“现在十余国通商立约，分往京师与各省口岸，实为数千年一大变局。”^①“大变局”中的外交领域，前所未遇的难题接二连三，“天津教案”和《里瓦几亚条约》便是典型的案例。

同治九年五月二十三日（1870年6月21日）发生天津教案，当场殴毙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及其秘书西蒙，并举火焚烧望海楼法国教堂、育婴堂、讲书堂、公馆和洋行，又焚毁英、美教堂数所，打死教士、修女、商人多人。李鸿章称此为“因迷拐讹言牵及教堂，遽将法领事、教士等殴毙多命，我无一失，彼挟全力，衅端重大，为通商二十年来未有之事”^②。

崇厚详细奏报事发经过：“未刻，忽闻有教堂之人，与观看之众，闲人口角相争，抛砖殴打。当派武弁前往镇压，适丰大业来署，当即接见。看其神气凶悍，腰间带有洋枪二杆，后跟一外国人，手执利刃，飞奔前来。未及进室，一见即口出不逊。告以有话细谈，该领事置若罔闻，随取洋枪当面施放，幸未打中，经人拉住。奴才未便与之相持，暂时推避。该领事进屋将什物信手打破，咆哮不止。奴才复又出见，好言告以民情汹涌，街市聚集水火会已有数千人，劝令不可出去，恐有不虞。该领事奋不顾身，云‘我不畏中国百姓’，遂盛气而去。奴才恐致滋事，当派弁随同护送。诿意该领事路遇天津县刘杰，自该堂弹压而回，该领事又向其放枪未中，误将刘杰之家人打伤。众百姓瞥见，忿怒已极，遂将丰大业群殴毙命。传锣聚集各处民人，将该教堂焚毁，并将东门外之仁慈堂焚烧。别处讲书堂，亦有拆毁之处。传教习教中外之人均有伤毙。奴才赶即督同地方文武，并派队弹压。奈百姓人多势众，顷刻之间，杀伤焚毁，已经成事。”^③

教案的起因，是事发前天津一带社会上传说有孩童迷失，为传教士买通中国教徒诱拐孩童至天主堂，将其害死，挖眼剖心，制作药材。“先是迷失幼孩者多，有蓬匠乘高见二小儿尾一人，踪迹得之，鸣于官。知府张光藻循吏也，立置于法，狱词牵连法馆王三。因索王三，领事不与，通商大臣崇厚延致署中婉谕之，则手洋枪发火，咆哮而出，于是津民哄然发愤，群殴击之立毙。并杀其妇女，又杀其类十余人，皆展肠裂腹，遂毁教堂，势汹汹至三四千人矣”^④。

清政府调派直隶总督曾国藩由保定赶赴天津，会同崇厚查办教案，处理善后事宜。六月初四日，曾国藩字谕纪泽、纪鸿儿：“余即日前赴天津，查办殴毙洋官、焚毁教堂一案。外国性情凶悍，津民习气浮嚣，俱难和协。将来构怨兴兵，恐致激成大变。余此行反复筹思，殊无良策。余自咸丰三年募勇以来，即自誓效命疆场，今老年病驱，危难之际，断不肯吝于一死，以自负其初心。”^⑤此时的曾国藩年老体弱，患“眩晕之症”，拖着病体赴津，途中与崇厚“往返函商，拟先将俄国误伤之三人，及英美两国之讲堂速为料理，不与法国一并议结，以免歧混”^⑥。

曾国藩抵津，“津郡民团，旧有水火会，名目人数甚众，怨崇厚公之护教，咸望公至，必力反崇公之所为。”曾国藩边调查边上奏，“凡诣公条陈此事者，或欲藉津人义愤之众，以驱逐洋人；或欲联合俄英各国之交，以专攻法国；或欲参劾崇厚，以伸士民之气；或欲调集兵勇，以为应敌之师”，他对天津教案发生的大背景及其后果十分清楚，所以“意在坚保和

第6681页。

^① 《筹办夷务始末》（同治朝）卷九十，第8286页。

^② 李鸿章：《复张振轩廉访》，《李鸿章全集·朋僚函稿》卷十，海南出版社1997年9月版，第2573页。

^③ 《筹办夷务始末》（同治朝）卷七十二，第6664～6666页。

^④ 陈义杰点校：《翁同龢日记》，中华书局1989年4月版，第776页。

^⑤ 《曾国藩家书全编》，中国华侨出版社2000年10月版，第2324页。

^⑥ 黎庶昌编：《曾国藩年谱》，李瀚章编辑、李鸿章校刊《曾文正公（国藩）全集·年谱》卷十二，台湾文海出版社1974年2月版，第19019页。

局，不与洋人构衅，以致启兵端”^①。他的处置方案引起清廷内部“讥议纷然起”，也引起民众的不满。天津知府张光藻于事发后密函禀报曾国藩：“查津郡□□^②杂处，民情浮动，悍回土棍，械斗常闻。自咸丰十年各国通商以来，遂设天主教堂。有入堂念经习教者曰教民，有跟随外国人服役者曰鬼奴。此二种人倚势欺侮平民，事所常有。而商宪（崇厚）维持大局，遇事委曲将就，未能持平，民间积怨颇多。”^③江苏巡抚丁日昌奏曰：“五月二十三日之变，在事官吏，既不能弹压于先，又不能缉犯于后，过误诚属不轻，然谓之无识无能则可，谓之有意激变则不可。”^④都认为崇厚护教、护洋人，“遇事委曲将就”，应该受到惩罚。

李鸿章的看法与曾国藩一致，认为“此案起衅之由，计非朝夕，教堂迷拐幼孩、挖眼剖心等说，全系谣传，向来各省滋事，大半由此”。崇厚如能“先事谕导，或临时禁阻，有法力可施，不至戕害洋官洋人如此多命”，而导致案发的真正原因，“似由崇公平日陷媚彼族过甚，洋风太炽，绅民含愤已久，触机一发，遂不可制。否则，传谣已久，何不出示谕禁？何不派兵弹压？盖不为民所畏信耳。事已决裂，乃转求威公使劝止兵船，又托俄、美领事说合赔偿，彼皆幸灾乐祸心肠，其何有济”^⑤？李鸿章明白案情的严重性：“从前捆一巴夏里，致兴大变；毙一白齐文，牵引群疑。各国皆有领事，各口皆有传教，彼视人命最重，况系官职。其请示国主，皆必谓动兵与否。罗淑亚尤矫强负气，即肯善办，必连官绅。勉从则拂輿情，不从则激他变。设令鸿章处此，自忖无术转圜。”^⑥自忖“无术转圜”的李鸿章还是被旨令“即驰赴天津，会同曾国藩、丁日昌、成林查办事件”^⑦。此时，能处理如此重大事件的，也只有李鸿章，他致函曾国藩称：“如崇公奉使，津门无主，自不可不速行。”^⑧

天津教案在近代教案中最为典型，影响极大，马士说：“半个世纪的种族嫌恶，十年来的民族怨恨，反基督教情绪的滋长，部分的基于宗教的偏见，部分的基于迷信，部分的基于轻信谣言，所有这些达到了一个共同的焦点，并且这种上长着的纷扰于三小时的杀人、放火和枪劫中达到极点。”^⑨曾国藩、李鸿章为了“保和局，不与洋人构衅，以致启兵端”，及表示“今中国力全邻好”，“先后两次，共得正法之犯二十人，军徒各犯二十五人，办理不为不重，不惟足对法国，亦堪遍告诸邦。”^⑩处置结果与时人的冀望大相抵牾。

曾国藩、崇厚认为，府、县等官员不应惩处，但迫于法使罗淑亚“要求之意甚坚，若无以慰服其心，恐致大局决裂”，于是决定“将天津府知府张光藻、天津县知县刘杰二员即行革职，请旨饬交刑部治罪，以示惩戒，而维大局”^⑪。曾国藩的“雅意不欲加罪于府县，是日乃勉徇崇厚之请，会奏此疏。拜发之后，公意痛悔之，病势渐剧”^⑫。未至天津时，曾国藩致函崇厚称“有祸同当、有语同分”，还出示晓谕，对民众“仍不奖其义愤，且亦有‘严戒滋事之语’，由是津人以怨崇公者怨公矣”^⑬。曾国藩与崇厚“有祸同当”，在津压制民众

^① 黎庶昌编：《曾国藩年谱》，李瀚章编辑、李鸿章校刊《曾文正公（国藩）全集·年谱》卷十二，第19019～19020页。

^② 朱东安原注为字体不全。据崇厚奏内有“津郡五方杂处，人心浮动”句，《（筹办夷务始末）（同治朝）》卷七十二，第6673～6674页。）缺字似“五方”或“华洋”。

^③ 朱东安整理：《有关天津教案的四份密件》，见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编：《近代史资料》总88号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5月版，第23～24页。

^④ 《（筹办夷务始末）（同治朝）》卷七十六，第7042页。

^⑤ 李鸿章：《复曾相》，《李鸿章全集·朋僚函稿》卷十，第2573页。

^⑥ 李鸿章：《复张振轩廉访》，《李鸿章全集·朋僚函稿》卷十，第2573页。

^⑦ 《（筹办夷务始末）（同治朝）》卷七十六，第6997页。

^⑧ 李鸿章：《复曾相》，《李鸿章全集·朋僚函稿》卷十，第2574页。

^⑨ 马士：《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》第二卷，三联书店1958年8月版，第270页。

^⑩ 《（筹办夷务始末）（同治朝）》卷七十七，第7098～7199页。

^⑪ 《请将天津府县官交刑部片》，李瀚章编辑、李鸿章校刊《曾文正公（国藩）全集·奏议》卷二十九，第4783～4784页。

^⑫ 《曾文正公（国藩）全集·年谱》卷十二，第19023页。

^⑬ 黎庶昌编：《曾国藩年谱》，李瀚章编辑、李鸿章校刊《曾文正公（国藩）全集·年谱》卷十二，第19019～19021页。

的“义愤”并“严戒滋事”，又“勉徇崇厚之请”，惩治了天津府县，虽“痛悔之”也为时已晚。时论对崇厚的谴责转向曾国藩，“‘卖国贼’之徽号，兢加于国藩，京师湖南同乡，尤引为乡人之大耻；会馆中所悬国藩官爵匾额，本湘人视为与有荣焉者，悉被击毁”^①。崇厚是这一事件的责任者，非但未被追究责罚，而且还“充出使法国大臣，是为专使一国之始”^②。

天津教案的发生暴露出天津防卫的弊端，给清政府以极大震动。崇厚任三口通商大臣几近十年，驻扎天津，专办洋务，兼督练兵、海防等，“该大臣有绥靖地方之责，无统辖文武之权，倘或各存意见，不听指麾，必须函商督臣于数百里之外”，遇有突发事件，无权调兵遣将，必须函商直隶总督。这与五口通商大臣有职权区别，五口通商大臣除薛焕一度专任外，以后皆由两江总督兼领，两江总督统辖苏、皖、赣三省，在清末督抚中权势极大。崇厚于咸丰十年末由长芦盐政改授三口通商大臣，“职分较卑”，后虽升至侍郎，但“相沿已久，碍难更改”。工部尚书毛昶熙提议：“五口专归两江督臣总办，十年以来，著有成效。臣以为三口通商，亦不必专设大员，所有洋务海防，均宜责成直隶总督悉心经理，并仿照五口通商大臣之例，特颁给钦差大臣关防，以昭信守。”^③总理衙门大臣们共同商酌，应毛昶熙所奏，“三口通商，不必专设大员，所有洋务海防，均责成直隶总督悉心经理”，并仿照南洋通商大臣之例，颁给钦差大臣关防，以昭信守。清廷予以批准，裁撤三口通商大臣一职，将所有洋务海防各事宜，统归直隶总督经管，照南洋通商大臣之例，颁给钦差大臣关防。

正在此时，两江总督马新贻被刺出缺，曾国藩被调任两江总督，直隶总督由李鸿章补授。有评论说：“李鸿章至津，值普法之战顿起，法人无法顾及此东方小问题，天津教案国藩任内未就绪者，遂由鸿章从容了结，政府中人懵于外事，以为鸿章外交之能力，固远胜国藩也。此鸿章得外交家名之始。”^④天津教案后，三口通商大臣一职不复存在，北洋通商大臣成为直隶总督的兼职，李鸿章表示“臣曾兼任南洋通商大臣五年，旧例尚在，未可前后易辙。计惟添设海关道，比照各口现办章程，责成道员与领事官、税务司等，商办一切，随时随事，禀臣裁夺。……至往来会晤仪节，务即斟酌适宜，此等事理虽小，动关体制，不敢不慎。”^⑤教案未平，总督遇刺，外患内忧，接踵而至，李鸿章宦官生涯中难得的机遇来临，不但总督直隶，而且兼任北洋通商大臣，还得了外交家之“美名”。自此，李鸿章立足扩展权势的牢固基石，在此后近三十年间，掌管清廷外交、军事、经济大权，成为握大柄、冠百僚的“中国独一无二之代表人”^⑥。

五

如果说处置天津教案时，崇厚还只是顺从洋人、庇护洋人，那么签署《里瓦几亚条约》时表现的奴颜媚骨、昏庸妥协，则做了丧失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的卖国行径。

光绪四年十二月初八日（1878年12月31日），崇厚一行抵达彼得堡。十二月二十八日（1879年1月20日）崇厚“敬捧国书”，“见其国主阿来三德（亚历山大）”，崇厚陈诵词曰：“大清国头等钦差全权大臣崇厚，奉本国大皇帝谕旨来贵国，一为通好，敬礼贵国大皇帝；二为修约。贵国前钦差驻华大臣倭良嘎理所议平安两国边界，及现任钦差驻华大臣布策所议边界通商各事，本国均愿妥为办理。请贵国大皇帝谕令外部王大臣，会同公平商办，期于两国有益。崇厚更愿两国邦交益臻和美焉。”^⑦就在这天，崇厚被补授为都察院左都御史。

^① 凌霄一士：《曾胡谭荟》，《国闻周报》第6期，第38期，第1页。

^② 崇厚述、衡永编：《鹤楼年谱》，第25叶。

^③ 《筹办夷务始末》（同治朝）卷七十七，第7103~7104页。

^④ 凌霄一士：《曾胡谭荟》，《国闻周报》第6期，第38期，第1页。

^⑤ 《筹办夷务始末》（同治朝）卷七十八，第7223~7224页。

^⑥ 梁启超：《李鸿章》，见《饮冰室专集·专集》之三，中华书局1941年6月版，第3页。

^⑦ 张德彝：《随使英俄记》，见钟叔河主编：《走向世界丛书》，岳麓书社出版社，1986年1月版，第649页。

从三月初至七月二十九日，崇厚与俄国驻华公使布策等共进行了三十一会谈，“七月二十九日辛丑，晴。申初，星使第三十一会布策。因条章定妥，拟于八月初八日赴立瓦的亚（里瓦几亚）庄，见俄皇画押盖印。”^①八月十三日，崇厚抵达里瓦几亚俄皇行宫。八月十七日，崇厚擅与俄国签订《里瓦几亚条约》。^②

《里瓦几亚条约》共十八条，另有《瑗珲专条》和《兵费及恤款专条》。同日还签订《陆路通商章程》十七条。按约中国仅收回伊犁，“中国接收伊犁后，噶尔果斯河西及伊犁山南之帖克斯河均归俄属；并塔城界址拟酌改，是照同治三年议定之界，又于西境南境各划去地断不少，似此则伊犁已成弹丸孤注，控守弭难。况山南划去之地，内有通南八城要路两条，关系回疆全局”^③。中国赔偿俄国五百万卢布（合白银二百八十万两），畀以通商、增设领事之权，使中国丧失伊犁以西以南及南疆、北疆边境等处大片土地，“崇地山收回伊犁一空城，竟举天下大势全付之俄人”。^④签约后，崇厚不俟清廷批准，擅自回国复命。消息传来，举国震惊，舆论哗然。八月二十三日颁布谕旨：“崇厚出使俄国，固以索还伊犁为重，而商务、界务，关系国家大局，自应熟思审处，计出万全。且叠经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电致崇厚，有若照来函，有碍大局，节略内并言所损已多^⑤，断不可行。该大臣尤应遵照办理，设法与之辩论，乃竟任其要求，轻率定议，殊不可解”。^⑥令慈禧太后和皇帝“殊不可解”的是，深受朝廷倚重的崇厚，“办理交涉之事有年，于边务、商务一切无不周知”，在俄国“竟任其要求，轻率定议”。

崇厚深受朝廷倚重是真，深谙外情则不然，对于新疆的地理形势及地理知识，更是一无所知。八月二十三日，恭亲王奕訢等奏称：“新修俄约界务、商务两宗，尤以界务最关紧要。查前此崇厚寄来布策所交伊犁、塔城、喀什噶尔三处更改界址说并伊犁图，其所指地方与中国舆图地名多不相符。”界务最关紧要，划分之处与中国舆图地名多不相符，可见崇厚连割让的地域在何处都不清楚。“此次第七款内载噶尔果斯河西及伊犁山南之帖克斯河，第八款载塔城界址拟稍改。据崇厚电报称均有图说，其彼此分界地方是否与布策前交图说相同，抑有续议更改之处，尚不可知。惟第八款既有两国派员勘定安设界牌之语，将来分界条约如果照行，其有损于中国无论已（矣）。惟就崇厚寄来伊犁分界一图而论中国受损究到如可地步，是否尚可设法布置，藉资补救之处，既应由左宗棠、金顺、锡纶就近酌度情形，妥为办理。”^⑦。难怪总理衙门也不明白“中国受损究到如可地步，是否尚可设法布置，藉资补救之处”。郭嵩焘一针见血地指出，崇厚“贻误国家”，“在不明地势之险要，如霍尔果斯河近距伊犁，特克斯河截分南北两路，均详在图志，平时略无考览，俄人口讲指画，乃直资其玩弄”^⑧。

此时，出使英国、法国钦差大臣曾纪泽正在巴黎，10月15日（九月初一日），在使馆，与归途中的崇厚“同谈极久。”^⑨曾纪泽在国外已有风闻，10月19日（九月初五日），“阅中西舆地图良久。因闻崇宫保与俄人订约交还伊犁，颇失要隘，为英法人所窃笑，故披图考察地形”。曾纪泽知晓应如何交涉，“去岁，尝与友人谈论崇公使俄，本是艰巨之任，然须经由

^① 张德彝：《随使英俄记》，第738页。

^② 《里瓦几亚条约》称为《伊犁条约》，又因系崇厚所签订，又称《崇厚条约》，但签订后，清政府拒绝批准，故未允准交换。条约详载《清季外交史料》卷十九，《总署奏俄国分界通商各事经审订签注拟议办法折一附〈签注条约〉、〈陆路通商章程〉、〈专条〉、〈附议专条〉及〈约章总论〉》。

^③ 《总署奏准使俄崇厚电称已与俄立约签押折》，王弢夫、王希隐编：《清季外交史料》卷十六，第27叶。

^④ 《郭嵩焘日记》第三卷，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10月版，第976页。

^⑤ “已多”二字，为《清季外交史料》原文所无，据《清实录》加之。

^⑥ 《总署奏俄约界务商务请饬左宗棠统筹全局片》，王弢夫、王希隐编：《清季外交史料》卷十六，第30叶。

^⑦ 《总署奏俄约界务商务请饬左宗棠统筹全局片》，王弢夫、王希隐编：《清季外交史料》卷十六，第28叶。

^⑧ 郭嵩焘：《前兵部侍郎郭嵩焘奏俄人构患已深遵议补救之方折》，王弢夫、王希隐编：《清季外交史料》卷二十，第18~19叶。

^⑨ 曾纪泽：《出使英法俄国日记》，第259页。

伊犁等处，亲览形势，乃与订约，方为一劳永逸，先难后获，否则恐为所欺。崇公取道海上，径达俄都，事虽神速，暗中不能不小有损失。今英人讥讪日闻，然余未接明文，不能深知事实。晤崇公，却言：事已了结，十分周妥。但愿余言幸而不中，不愿不幸而言中也”^①。崇厚贪图方便，不经陆路行走，更不用说实地考察了，如此草率，“不幸而言中”了。

左宗棠镇守西北边境，对“新疆情形了如指掌，金顺、锡纶久在西北各路，谙习边情。且西路通商应如何布置，始能害少利多，左宗棠必有权衡”。左宗棠早已“察俄人用心，盖欲据伊犁为外府，占地自广，藉为养兵之计，久假不归，布置已有成局。”而“我索旧土，俄取兵费，巨资于俄，无损而有益。我得伊犁，只剩一片荒郊。北境一二百里间皆俄属部，孤注万里，何以图存？”还特别指出崇厚所议的第七款，“接收伊犁后，噶尔果斯河及伊犁山南之帖克斯河归俄属，无论两处地名，中国图说所无，尚待详考。”中国地图上尚未标明的地区，也莫名其妙地划归俄国，是糊涂？是无知？是两者皆有？难怪左宗棠叹息道：“自此伊犁四面俄部环居，官军接收坠其圈内，故不能一朝居耳。虽得必失，庸有倖乎？武事不竞之秋，有割地求和者矣。兹一矢未闻加遗，乃遽议捐弃要地，履其所欲，譬犹投犬以骨，骨尽而噬仍不止。目前之患既然，异日之忧何极？可为叹息痛恨者矣。”^②

除了昏庸无知外，崇厚还另有私图，这便容易陷入对方设下的圈套而不能自拔。七月下旬，崇厚急欲完成使命而归国，俄方产生疑惑。七月二十六日，俄外务部侍郎热梅尼向俄外务部尚书格尔斯汇报说：“中国大使急需完毕交涉，渠今晨告余：关于松花江议定书之撰拟，渠已与布策意见一致，送呈皇上裁决之条约草案是否已获陛下批准？渠要求阁下以电报告之。”^③八月初二日，再致格尔斯函：“吾人正与中国人从事整理副本细节及条约之认可。中国人要求准备签字之誊本须于星期六备妥。惟余怀疑此事是否可能。”^④八月初八日，崇厚离开莫斯科前往里瓦几亚，格尔斯致热梅尼函：“中国人之到来使余略感惶惑；——边境之消息使皇上不满，皇上之意，条约须在吾人对中国当局无所不满时始付实施之条件下签字。此意必须表明于一分别之文件中。”^⑤八月十七日签订条约后，格尔斯叹道：“余兹幸已将中国人摆脱矣！彼等曾使余大为烦乱。”^⑥

如此急促慌乱的原因多半在于崇厚的私事，他的自传中有这样一段话：“厚抵俄，在利代第亚谒俄皇，宣布所负使命，遂与订约。屡次磋商，颇费唇舌，只以我国兵力已疲，库款支绌，边防又不足恃，欲维大局之安危，不得已而勉应之，签字换约。旋即拜折复奏，并迎折起行。冬月十四日抵京，不意蒋夫人于十二日逝世，不胜悲悼。”^⑦崇厚自上年十月十四日离沪赴法，至“12月6日（十月二十三日），崇厚乘轮离沪北上”^⑧，一年多身居异国，家属是他最为牵挂的，蒋夫人身患重病使他焦虑不安，无心在外久留。崇厚十八岁那年，“吾父为厚定婚。外舅蒋月川公讳明远，道光辛巳举人，官山东督粮道之女，蒋砺堂相国之侄孙女，即蒋佳夫人也”^⑨。崇厚匆匆了结交涉，回家探病，结果还是晚了一步，没见到蒋夫人最后一面，“不胜悲悼”。

办理中外交涉必须有所付出，必须有献身精神。曾国藩查办天津教案时表示，“危难之际，断不肯吝于一死，以自负其初心。”曾纪泽曾对慈禧太后说：“臣从前读书到‘事君能致

^① 曾纪泽：《出使英法俄国日记》，第262页。

^② 左宗棠：《复陈交收伊犁事宜折》，见《左宗棠全集》第十册，奏稿卷55，上海书店1986年6月版，第8659～8666页。

^③ 《热梅尼致格尔斯函》（俄历8月31日），袁同礼译：《伊犁交涉的俄方文件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丛刊（2），1966年11月版，第8～9页。

^④ 《热梅尼致格尔斯函》（俄历9月5日），袁同礼译：《伊犁交涉的俄方文件》，第9页。

^⑤ 《格尔斯致热梅尼函》（俄历9月11日），袁同礼译：《伊犁交涉的俄方文件》，第91页。

^⑥ 《格尔斯致热梅尼函》（俄历9月20日），袁同礼译：《伊犁交涉的俄方文件》，第92页。

^⑦ 崇厚述、衡永编：《鹤榭年谱》，第30叶。

^⑧ 汤志钧主编：《近代上海大事记》，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年5月版，第362页。

^⑨ 崇厚述、衡永编：《鹤榭年谱》第8叶。

其身’一语，以为人臣忠则尽命，是到了极处了。近观近来时势，见得中外交涉事件，有时须看得性命尚在第二层，竟须拼得将声名看得不要紧，方能替国家保全大局。”^① 崇厚虽未遇到危及生命之事，但他把私事看得重于一切，不顾国家利益，怎么能“替国家保全大局”呢？

李鸿章屡办外交，在十月初二日的《奏议交收伊犁事宜折》中，将签约后果作如下分析：“彼国上下深谋，视（伊犁）为奇货，藉端要挟，不餍其欲壑不止。俄人阴鸷狡诈，虽英德等国皆视为劲敌，而惮与共事。我出使大臣宜沉毅坚忍，置得失荣辱于度外，又必统筹全局，相机应付，以全力与之蹉磨，乃不至堕其术中”。他指出崇厚的致命弱点，“在崇厚或因使俄之役，以索还伊犁为重，既急欲得地以报命，而他务之利病，遂不遑深计，诚未免失之轻率。”强调伊犁的重要性不容置疑：“细揣俄人用意，一则哈萨克鲁布特游牧诸部新附俄邦，今复遮其四境，绝彼向化之途；一则扼我咽喉，使新疆南北声气中梗，心殊叵测。夫中国所以必守收伊犁者，以其居高临下，足以控制南八城。谈形势者谓，欲守回疆，必先守伊犁也。今三面临敌，将成孤注，自守尚不易图，乌足控制南路？想左宗棠碍难遵办。是界务与商务相较，界务固尤重矣。总理衙门原奏谓收回伊犁尚不如不收之为愈，洵为洞见底蕴。”还强调崇厚失误的严重性：“查同治八年英国新约，以彼国未经批准，至今不行。同治二年葡萄牙使臣来约，以争论澳门设官一事，迄今未互换。现修俄约，既有‘批准后通行’之语，又有西国成例可援，原可置之不行，且与万国公法所论，亦有相符之处。第此次崇厚出使，系奉旨给与全权便宜行事字样，不可谓无立约定议之权。若先允后翻，其曲在我。自古交邻之道，先论曲直，曲在我，而侮必自招。用兵之道，亦论曲直，曲在我，而师必不壮。今日中外交涉，尤不可不自处于有直无曲之地。我既失伊犁，而复居不直之名，为各国所讪笑，则所失更多。”^②

与某些欲置崇厚于死地的官员不同，李鸿章提议积极补救，尽量挽回损失：“窃思崇厚电音简略，其定约时如何辩议，尚未尽知。若使当日明知俄人各事，必俟批准后方能举办，或另有活动之语，或别有转圜之法。约计该大臣冬月可以回京，应由总理衙门王大臣密与详询，体察情势，俟换约时，能否将界务、商务酌议更改，如改得一分，亦获一分之益。倘实无可改易，无可延宕，嗣后界务应如何布置，谅左宗棠必就近酌度妥办。至商务补救之方，大要有二，一曰立法；一曰用人。”^③为宽解崇厚罪名，李鸿章致总署函：“伏思崇公仅予斩候，在圣恩已属从宽，而外人不知中国定例，见有斩字，疑为莫保首领，遂谓辱及彼邦，与其数年以后，仍递减遣戍似不若。乘劫刚将行之际，特旨宣布，使四夷怀德，俄人归心，衅端无自而开，约章徐议更定，此事庶有结局。否则，威使赫德之言虽未可尽信，亦难保必无。崇某一入无足计较，而大局安危，关系甚重，想执事亦钦钦在抱也。”^④最终暂免崇厚的斩监候罪名，仍行监禁。

六

崇厚在晚清先后参与普鲁士、丹麦、荷兰、西班牙、比利时、意大利、奥地利等国约章的签订，担任通商大臣要职，代表总理衙门，与各国交往，还兼办制造、练兵、海防等事务。崇厚曾创下几个第一：首任三口通商大臣；充出使法国大臣，为专使一国之始；首位出使俄国钦差大臣等。在外国侵略者侵犯中国土地时，崇厚“从事军营所见，中国器械，寔系远不如外洋迅利。非特洋炮炸弹并以制胜，即鸟枪亦较中国远而且准，且上有长矛，亦可借以交

^① 曾纪泽：《出使英法俄国日记》，第114～115页。

^② 李鸿章：《奏议交收伊犁事宜折》，吴汝纶编：《李鸿章全集·奏稿》卷35，见沈云龙主编：《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辑》，台湾文海出版社，第1117～1118页。

^③ 李鸿章：《奏议交收伊犁事宜折》，吴汝纶编：《李鸿章全集·奏稿》卷35，第1119页。

^④ 李鸿章：《请宽解崇厚罪名以固邦交》，《李鸿章全集·译署函稿》卷十一，第3167～3168页。

仗。其火药铅弹，工料俱精”，他向总理衙门建言：“如果不惜重资，设法购买，加以挑选将弁，训练兵丁，必可得力。”^①认为应尽快提高自己的军事实力，而不是与强敌蛮干，要大量购入先进武器，并选将练兵，“必可得力”，这是崇厚合情合理的建议，似较那些盲目排外，不识军务的人稍胜一筹。但他的外交知识实属有限，远远不能适应外交场合的需要，只因系满族亲贵而为清政府恩宠眷顾，让他出使各国，办理“抚局”，由候补三四品京堂一跃成为二品侍郎，即使在天津教案中办理得很不光彩，也还是委以重任。

清政府任用崇厚经办外交，不是因为崇厚懂得外交，而是因为他的“金源世系，珂里名门”、“三韩贵胄，七叶名卿”，因为他是满洲贵族。任用这样一个外交官，当然发挥不出突出作用来。崇厚“参理夷务”、协办“抚局”，连李鸿章都认为“我无一是一，彼挟全力”的天津教案，崇厚“昏庸妥协”，顺从洋人，后发展为签署《里瓦几亚条约》的昏庸卖国行径，又“不候谕旨，擅自起程回京”，“违训越权”，将“便宜行事”随意行使，自便私图，办事胆大妄为，丝毫不顾纲纪国法，不正是依仗自己“金源世系，珂里名门”的特殊身份吗？！

在左宗棠、曾纪泽、张之洞等一些汉族官员的指斥下，崇厚还是没有受到应有的处罚。甚至在他死后多年，昔日的宣统废帝溥仪于一九二二年十月十三日（1922年12月1日）结婚时，还开恩为崇厚平反，于十一月十五日（1923年1月1日）颁布“上谕”：“御前侍卫花翎头品顶戴正红旗满洲都统衡永之父，二品衔原任太子少保头品顶戴双眼花翎都察院左都御史崇厚，著开复原官、原衔翎支。”^②清政府已经覆亡十二年了，退位的溥仪还会发出如此“上谕”，也只是留下一份可笑的记录而已。

外事活动，也就是所谓的“夷务”，是鸦片战争以来的一件新事务，真所谓“千年未有之局”，清政府对此也算是重视的，但真正掌权的都不是汉人，如鸦片战争时期的钦差大臣琦善、御前大臣奕山、皇侄奕经，以及签订《南京条约》的耆英、伊里布等都是满人；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，领军人物大学士桂良、吏部尚书花沙纳、留守北京的钦差大臣奕訢也不是汉人。咸丰帝批准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，最初的总署大臣奕訢、桂良、文祥，三人都是满人。奕訢是恭亲王，主持“夷务”多年，只是到了办事困难时才调遣汉人料理，这与其说是清政府对“夷务”的重视，毋宁说是对汉人的不信任。

奕訢曾被李提摩太称为“他是我所见过的最专横的人，身体的每一英寸都是一位王爷，一举一动都似乎在表明他是众人之中的神明”^③的人，于1884年被慈禧太后罢免了职务，虽后又起用，但也无济于事，李鸿章遂为握大柄、冠百僚的“中国独一无二之代表人”。

那么，从崇厚的任用、失职和处理中，也启示我们，清政府对满汉官员的任免是存有差别、存有矛盾的；“任人唯亲”带来的弊端，教训是深刻的。

^① 《总署收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函》，《海防档·甲·购买船炮》（一），第18页。

^② 崇厚述、衡永编：《鹤榭年谱》，第43叶。

^③ 李提摩太著、李宪堂译：《亲历晚清四十五年——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》，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5月版，第228页。